

温立三·著

新世纪语文 教育改革透视

山东教育出版社

温立三·著

新世纪语文 教育改革透视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语文教育改革透视/温立三著.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28—9260—0

I. ①新… II. ①温… III. ①语文课—教育改革—研究—中小学 IV. ①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15507 号

新世纪语文教育改革透视

温立三 著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4 传真: (0531)82092625
网 址: www.sjs.com.cn
发 行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mm×1000mm 16 开本
印 张: 21.75 印张
字 数: 28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9260—0
定 价: 45.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0534—2671218

序

顾振彪

当今世界,呼唤复合型人才,精通一门,兼通其他。语文课程具有综合性特点,尤其要求语文课程工作者的素养全面,不仅是某一方面的专家,而且是杂家、通才。就以语文教育界“三老”来说,他们都是教材编辑家,但叶圣陶先生同时是作家,语言功底极为深厚;吕叔湘、张志公两位先生同时都是语言学家,又都曾创作过文学作品。如果他们没有作家或语言学家的素养,能成为教材编辑家吗?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还从来没有过纯粹编辑出身的教材编辑家。诚然,今天不能要求出现像古代达·芬奇和张衡那样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出现大批复合型人才,则是完全可能而且非常必要的。

立三同志是教师、研究员、编辑和作家,一身兼四任。他过去是教材编辑,现在是大学教师,术业有专攻;又始终业余坚持文学创作。而语文教育研究,贯穿于编辑、教学和创作生涯之中。也可以说,是他的编辑、教师和作家的素养,成就了他的语言教育研究工作。因此,尽管现在繁荣的图书市场

上,语文教育新著时时面市,人们有点审美疲劳,这本《新世纪语文教育改革透视》可能很难引起什么轰动效应,但由于它出于一身兼四任的立三同志之手,因而自有其特点,某些部分也许能使人眼睛一亮。

比如书中关于语文教材的论文。立三同志参与编写或主持编写多套中学语文教材,作为局中人深知教材编制的个中三昧,而他又从教师、作家、研究员等局外人视角审视语文教材,从局中到局外两方面观照,得出的结论自然超乎一般。像对语文教材内容的构成,对中外比较视野中的教材编制模式,对解放以来新诗的选编,都不乏真知灼见。

又如关于中学鲁迅作品研究的论文。我国鲁迅研究专家不少,但研究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的专家不多,以中学教材编制者的身份研究鲁迅作品者更少。立三同志在北大攻读文艺学,就钟情于鲁迅作品,在编制教材时对鲁迅作品下过大功夫;自己又是作家,时时创作文艺作品,对鲁迅作品的理解,远深于一般编辑。因此,阐释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立三同志绝对是高人一头的。

再如关于中职语文教材的论文。虽然只有一篇,但观点鲜明,论据充分,剖析透彻。能发人所未发,见人所未见。立三同志从事编制中职语文教材的时间不长,但有长期编制中学语文教材的经验,加上他的教师、作家、研究员的素养起作用,当然能洞悉中职语文教材的底里。这篇论文对广大中职语文教材的使用者很有启示。

2007年,立三同志出版了《语文课程的当代视野》,引得不少同志的喝彩。一位优秀教师说:“一二十年以后,立三同志必有成就!”现在,立三同志在出版文学作品的同时,这本《新世纪语文教育改革透视》问世,又在获得成就的路上前进了一步。衷心祝愿立三同志早日把那位老师的预言变成现实。

目录

序 / 1

语文课程改革研究

探寻语文课程性质的历史与现状 / 1

语文课程的当代性表征 / 15

新语文教育行动:向“四化”迈进 / 25

强调读写结合:2011年版课标新亮点 / 30

语文教材改革反思

解放以来中小学语文教材论争及思考 / 33

中学语文教材建设六十年反思 / 59

论语文教材内容构成 / 61

语文教材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思考 / 71

直面课标语文教材的四大弊病 / 78

新编中职语文教材的优点与缺憾——以基础模块为分析对象 / 83

中外比较视野中的语文教材编制模式 / 93

民国元年小学国文教科书中的共和思想宣传——以商务和中华版教科书为例 / 101

解放以来中学新诗选编及几点看法 / 105

语文教材练习设计的历史回顾 / 109

语文热点年度追踪

2007 语文理论热点年度追踪与述评 / 112

2008 语文理论热点年度追踪与述评 / 130

2009 语文理论热点年度追踪与述评 / 151

2010 语文理论热点年度追踪与述评 / 171

2011 语文理论热点年度追踪与述评 / 193

2012 中职语文教学研究年度概览 / 215

中学鲁迅作品探索

中小学鲁迅作品选编九十年 / 247

鲁迅的知识结构和人文素养 / 276

中学鲁迅作品细读举隅 / 285

随笔·杂谈·序跋

名师何以成为名师 / 295

怀念顾黄初先生 / 306

选编《看云识天气》的三点理由 / 310

一篇初中新课文背后的故事 / 313

一篇长盛不衰的红色经典 / 319

民国以来中学课本中的徐志摩作品 / 323

语文教材编写需要调查研究 / 330

写作是一种习惯 / 332

诵读与积累:学习古诗文的关键 / 335

中国的教育家在民间 / 337

后 记 / 340

语文课程改革研究

探寻语文课程性质的历史与现状

一、语文课程性质认识的历史描述

性质，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性。关于语文课程的性质，自现代语文课程诞生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虽然有些阶段不直接表现为“性质”之争，而是目的或目标之争，但实际上都是关于课程性质的问题。在许多一线教师看来，性质不性质与我无关，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对语文课程性质认识怎样，直接关乎语文课程的价值取向，主导着语文课程的实践。

语文性质之争主要因为“语文”名称的歧义而引起。关于“语文”的内涵，共有“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章”“语言文化”四种说法，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内涵却相差很远，导致语文课程的导向和实践上的不同。

1. 十七年：“纯语文”与“政治性”

从解放到1956年这七年时间里，新中国政府没有颁布正式的语文教学大纲，但相关的文件和领导讲话，以及1950年编辑的新中国第一套语文教科书，无不强调语文教学中的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性，甚至认为语文教育的目的就是政治思想教育，只不过语文学科要通过具体生动的课文做例子进行这种教育。如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编辑大意”说：

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政治思想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科更显得重要。要通过语文科来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不能单靠几篇说理的论文。一种思想内容或一个政治道理，可以用一篇说理的论文来表达，也可以用一篇小说，一首诗歌，一个历史故事，或者一个自然科学的故事来表达。……要这样，才能够完成通过语文教学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才能够使学生得到深切的感染，对学生发生切实的作用。

短短一段话，多次重复“政治思想教育”六个字。

当时的东北教育部领导、后来的教育部副部长、科普作家董纯才在1950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中学国文教学》讲话中说，在语文教师中，存在着要么是“超政治的单纯语文观点”，要么是“倒向超语文的单纯的政治观点”两种极端倾向，前者应该受到坚决批判；对于后者，重点在引导，使教师认识到“必须通过对语文形式的仔细讲解来使学生具体而深刻地体会文章的思想内容，而不是把思想内容抽离出来，脱离开具体表现它的语文形式来抽象地讲解或另外发挥一套”。这里，这位领导对语文教育中的“超政治的单纯语文观点”更为反感。

总之，在全国解放后的最初几年里，语文教育紧紧围绕如何更好地进行人们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而展开。语文的背后是强大的“政治”。我们谓之“语文”与“政治”的时代。

1956年，国家颁布《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和《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汉语教学大纲非常强调

汉语的工具性特点,并引用列宁的“语言是人类交际极重要的工具”这句经典论述,同时强调“汉语是对青年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种重要的、有力的工具”,“应该结合初级中学汉语教学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培养学生的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热情”,“培养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文学大纲则提出“教养任务”和“教育任务”两大任务,前者主要针对“语文”的特点,包括领会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了解文学理论常识和文学史知识、丰富语言知识并学会明确地表达思想感情;后者则属于“政治思想教育”：“帮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培养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培养共产主义道德,特别是爱国主义精神,共产主义劳动态度,集体主义精神,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精神,……培养正确的审美观点,特别是对社会生活的明确的是非、善恶观念和热烈的爱憎感情。”政治思想教育“担子”无比沉重。但是,汉语文学大纲及教材特别是文学教材两年后被废弃,其主要理由就是“非政治倾向的表现”太明显,于是,取而代之的是极度偏重政治思想教育而相对忽视语文知识教学的语文教材。

1958年在政治上是一个“浮夸”的年代,作为政治斗争“晴雨表”的语文教育自然受到影响,语文课程“左”的倾向已露端倪。好在这样的时间持续不长,便很快被发现并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1959年,以《文汇报》和《光明日报》为首开展全国范围内的“语文教学目的任务”大讨论,其实质就是语文课程性质的讨论。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语文教学应通过语言文学的教养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教学生“学会了文”是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学通了道”是自然的结果,“语文教学必须兼取其文,而且以取文为前提”^①。在之后的几年里,语文教育界继续展开讨论,对于语文教育中“语文”与“政治”两者关系问题逐渐形成共识。这些共识及时反映到了1963年颁布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中,大纲第一句话就明确提出了语文作为一门工具的特点:“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项工作的基本工具。”然后提出中学

^① 刘培坤:《“文”与“道”——关于语文教学目的任务之我见》,《文汇报》1959年6月3日。

语文教学最重要的任务在于“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的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并用相当的篇幅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和语文教育的关系”,认为“道”和“文”是不可分割的,“道”自然通过“文”表现出来。根据这份大纲编写的教材也非常重视语文的读写训练。

1963年的大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经受了时间的考验。那是一个对语文课程性质认识头脑比较冷静的时代。遗憾的是,否定一切的“文化大革命”很快来临。

2. 新时期:“工具性”与“思想性”

新时期初期对语文课程性质的认识,其实是对“文革”中的极“左”政治在语文领域的拨乱反正。但拨乱反正一步到位何其难也!首先从1978年颁布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中看出,这份草案以毛主席语录开路,留下了鲜明的“文革”印记:“语文课的思想性政治性很强,历来都是为一定阶段的政治服务的。我们的语文教学,必须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深入批判‘四人帮’,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课文选编要求也是以毛主席语录开头:“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对课文的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和适合教学三点要求中,重点阐述了“思想内容好”:

课文的思想内容要有助于向学生进行热爱领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热爱劳动、热爱科学的教育,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解放以来的作品,要反映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的

伟大胜利。^①

显而易见,以这样的大纲编出来的教材自然好不到哪里去,造成语文教育一度徘徊不前。

在这种情况下,张鸿苓发表《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一文,试图让语文界对语文课程性质的认识回归到1963年大纲的基点之上。于是,1980年修订后的大纲明确指出,“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语文课在进行读写训练的同时,还必须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必须在读写训练的过程中进行,读写训练也必须以正确的观点为指导,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由此看出,仅仅过了两年,语文界对语文课程性质的认识就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与1963年大纲的观点取得了高度一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当然首先要归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潮。自此开始,新时期每一次语文教学大纲都鲜明地写入语文的工具性特点,如1986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表述为:“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普通教育阶段的各门学科都是基础学科,语文则是学习各门学科必须掌握的基础工具。”1988年《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初审稿)》表述为:“语文是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语文学科是学习各门学科的基础。”1990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修订本)》和1992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均作了同样的表述。这样,语文的工具性特点像宪法一样牢牢写入大纲之中。在强调语文工具性的前提之下,以上大纲强调语文课程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如1986年、1988年和1990年的大纲均提出:“正确处理语文训练和思想教育的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统一的。语文训练必须重视思想教育,思想教育必须根据语文的特点,渗透在教学的过程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1992年的大纲对此问题的阐述又进了一步:“语文训练和思想教育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要因

^① 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38页。

文解道,因道悟文,引导学生通过语言文字正确理解课文的思想内容,又在领会思想内容的基础上,加深对语言文字的理解,收到语文教学应有的效果。”

这里顺带提及 1991 年国家教委制定和颁布的《中小学语文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纲要》。这份纲要的出台有它特殊的政治背景,专门为语文学科制定思想政治教育纲要,这在 20 世纪的现代语文课程发展史上是唯一的一次。纲要中列举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内容有:热爱祖国壮丽河山、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而更加热爱共产党;认识旧社会的黑暗和新中国的光明,通过新旧对比,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了解伟大民族传统和学习崇高爱国主义思想,继承和发扬近百年来我国人民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认识我国人民优良的伦理道德传统,培养共产主义道德情操。纲要主要就以上五类政治思想教育内容列举相应的推荐课文篇目,并要求对现行教材中的部分课文进行调整。最后,纲要指出:“要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是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教学过程中要处理好语文知识和传授、能力培养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善于运用语文教学的特点,紧扣课文的思想内容,阐明道理、激发感情,陶冶学生情操,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①

总的看来,这一时期尽管政治上不是年年太平无事,但对语文课程性质的认识大体上是符合语文课程的特点和规律的,并且一以贯之地坚持下来,没有形成十七年那样的认识波动。

3. 新世纪:“工具性”与“人文性”

20 世纪 90 年代,世界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各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冷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信息化进程加快,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闭关自守;文化,一方面多

^① 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 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23 页。

元化,另一方面强势价值观念对弱势文化形成前所未有的强大冲击。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的基础教育必须摒弃落后观念,引进时代理念,因此,世纪之交的基础教育改革,谈得最多的是培养参与未来世界竞争的人才。于是,人们发现,过去抱守的“政治思想教育”与培养世界公民的要求格格不入,应扩大其内涵。就语文课程来说,除保留传统的爱国主义、民族传统、诚信正直、孝敬长辈、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教育等观念外,还增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强调的诸如国际理解、人类友爱、尊重他人、关怀弱势、公民责任、勇敢坚强、乐观向上、人权尊严、宽容理解、负责合作、热爱自然、生态保护、科技发展、追求真理、民主法制等思想、道德和文化观念等。这些观念显然是以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所无法全部涵盖的。于是,用“人文”一词来表述似乎更为合适。

当然,“人文性”的提出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那就是由于以前语文课程过于追求所谓科学化而陷入严重的僵化状态,片面追求升学率导致应试教育泛滥成灾,语文课程的“工具性”特点被严重歪曲,将语文演变为一种对学生进行牲口式训练的应试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语文本身所固有的丰富人文内涵没有了,一篇篇课文被肢解为枯燥无味的字词句,无法上升到文化的高度,深入到思想的深度。这些很不正常的现象,在20世纪末的语文教育大讨论中,被许多有识之士痛心疾首地指出。必须承认,世纪之交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改革,政府比较充分地听取了民间的声音并努力把合理的建议贯彻到课程改革实践之中。

对语文“工具性”的认识经过了几代语文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并与反复出现的各种干扰进行斗争,才在新时期的历次大纲中“敲定”下来,成为不变的“法律条文”。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语文教学中一度出现对语文“工具性”的歪曲,并不是“工具性”本身提法错误,而是对它理解的偏差和实践的失误。所以,新世纪的两份初中语文课程改革文件:2000年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2001年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都坚持语文的“工具性”：“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

工具。”但我们真正应该注意的是这两份纲领性文件中另外的话。2000年的大纲说：“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的课程标准又加上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至此，语文界对语文课程性质的认识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二、当代语文课程性质的三重含义

以上看出，对于语文课程性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它不仅受制于人们对语文课程本身规律的认识，而且受制于风云变幻的政治气候。不过，不管怎么样，世界各国的母语教学无不重视语言教学，即掌握和理解本国的语言文字，我国的语文教学也一样。叶圣陶先生和张志公先生这两位语文教育前辈都一致强调语文的核心是语言。后来人们对“语文”的争议，无论说它是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化还是语言文章，“语言”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因此，探讨语文课程的性质，应当紧紧抓住母语学习这一层意思不放。在此基础上，课程标准结合时代的发展变化，对语文课程性质作出如下表述：“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据此我们可以说，语文是一门以学习语言为主的工具性的课程，也是一门包含深厚文化内涵的人文性极强的课程，是工具性与人文性高度统一的课程。

1.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一般地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里把“语言”换成了“语文”，可见，“语文”的核心内容是语言。确实如此，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语文学习不是以学习本国本民族的母语作为首要任务？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的语文课，主要是教给孩子识字写字，等识字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再训练他们的读写能力。可以说，语言是构成“语文大厦”的基本元素，一个词，一句话，一篇文章，都是由语言文字组成，如果这些语言文字没有掌握，其他什么便都谈不上。即便学生识字量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听说读写能力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也存在一个精益求精不断丰厚的问题，对语言的学习是没有止境的。

只要是学习语文,就是在学习语言。

语文是思维的工具。以学习语言为核心的语文学习过程,也是训练思维的过程。思维活动必须借助于语言来进行,没有语言就没有思维。语文学习包括训练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语文水平不好的人往往思维能力也不行,特别是形象思维能力差;反之亦然。

语文是学习的工具。在学校里,语文是学好其他各门课程的基础工具,因为除外语之外的所有课程,都必然包含着汉语文的成分比如汉语言的表达,各门学科的学习都需要听说读写的基本功,哪怕是写一篇科学实验报告,也何尝不需要语文?

语文是生活的工具。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活着总要工作、生活,总要与不同的人交往,如果没有一定的语言水平,没有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就会举步维艰。出过国的人在这方面就深有体会,如果你对这个国家的语言一无所知,那你看不懂听不懂不会说不会写。你不会使用这个国家的语言,就意味着所有的一切向你关闭,你就无法生活下去。

关于语文工具性的特点,许多语文教育前辈有深刻阐述。

叶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确定语文学科的性质是工具,语文是人生活不可缺少的工具;二是确定语文教学的任务在于帮助学生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这两点其实都强调了语文作为工具的特点。他在1942年发表的《略谈学习国文》中说:“学习国文就是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字。”这里,把“国文”理解为“语言文字”;同年发表的《认识国文教学》中则提出:“国文,在学校里是基本科目的一项,在生活上必要工具中的一种。”1950年叶圣陶先生关于“语文”这一学科名称的解释,更是全面体现他关于语文工具性和以语言学习为中心的语文性质的认识。正因为强调语文是一种工具,学习语文主要是学习语言,所以,叶圣陶先生反复强调语文学习以训练语言能力为核心的听说读写的重要性。

吕叔湘先生同样强调语文的工具性:“语言文字本来只是一种工具,日